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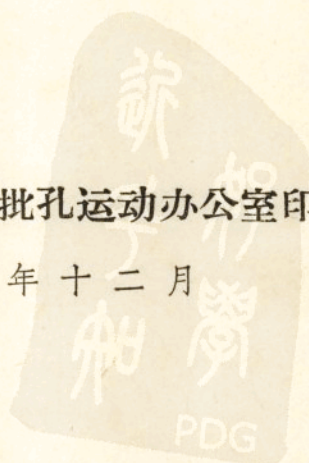
为印发反动大字报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以供批判而写的按语

附：一张反动大字报：

《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中共广州市委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印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为印发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以供批判而写的按语

(一)

正当全市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努力发展大好形势的时候，李一哲一再抛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他打着批林的幌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公然煽动要搞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向我们挑战，态度极其嚣张。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它再一次提醒革命的人们，在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对这张反动大字报，广大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早已按捺不住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一再要求组织批判，表现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精神。也说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识别香花毒草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深入批林批孔，遵照毛主席关于有毒草就得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的教导，现在我们将它印发给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供广大革命干部、群众批判之用。我们深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的全市革命人民——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

识分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将会抓住这株毒草，对照叛徒卖国贼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作为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部分，广泛开展革命大批判，从而使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深入，锻炼和造就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学习与批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战斗，发展大好形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二)

这张反动大字报，初稿写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为二稿，曾经在街上张贴过。最近，他删去了原来的前言，加上了一万三千多字的序言，重写了第六部分，把前五部分作了精心的“少量修改”，于十一月十日再次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北京路口，共六十七张白报纸，二万六千多字。可谓五光十色，洋洋大观。正如他自称的：“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他还标榜这个“体系”“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

这张“够得上一个‘体系’”的大字报，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它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还是在歪曲党的基本路线？它是要批林批孔，还是竭力破坏批林批孔？它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它是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和法制，还是要的是地

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可以乱说乱动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到李一哲“体系”的实质和要害。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特别是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为锐利武器，剥掉它的伪装，就不难看出，李一哲的“体系”，完全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一、它恶毒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污蔑“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是什么“新的礼教原则”。污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把正确评价秦始皇、“肯定焚书坑儒的进步作用”，污蔑为“无原则地吹捧秦皇朝的封建专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为海瑞“落实政策”；攻击“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等等，指桑骂槐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它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军队。肆意歪曲和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抽掉其阶级内容和基础，而胡说什么“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不是“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断言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新贵集团”，这“是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不以人们意志转移而产生的”。说这个“特权阶层”“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的军队‘治’

成袁世凯北洋军阀那样的军队”。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蜕变为“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党的领导干部“完成了由‘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胡说“既得利益势力集团”和“新兴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是“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妄图煽起一个“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象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那样起来搞什么“新的政治变革”，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三、它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嚷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反而“确立了林彪体系”，“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而且至今未被清算”。

四、它污蔑批林批孔运动。胡说这个运动是“千方百计地掩盖……‘礼治’的秘密”，“这实际上是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

五、它恶毒攻击、污蔑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污蔑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是什么“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搞的，是好象“王明反李立三的‘右倾’”一样可笑。污蔑“十大”提出的“反潮流”的原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什么“现在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可能形成潮流”。恶毒歪曲和攻击党中央所支持的黄帅、张铁生、钟志民的反潮流精神。

六、它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的否定，污蔑我国人民民主权利没有保障，现在比鲁迅所处的时代还不如，说“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去发表他们

的文章呢？”他歪曲革命人民运用大字报的目的和性质，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西方通讯社都很“赞赏”的“‘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大声疾呼要有“串连的自由”，要允许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派”。他还装扮成“为民请命”的样子，胡说我国工农劳动群众“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妄图挑拨党群关系，贩卖经济主义黑货。李一哲所鼓吹的什么民主啦！法制啦！要写到宪法里面去啦！戳穿了，就是要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以民主，要保护地、富、反、坏、右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受惩罚的那种法制。他要的宪法是一部资产阶级的宪法。

七、它否定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我广大党员进行恶毒攻击。它污蔑人民群众“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并有什么“怀旧情绪”。在大字报定稿时，李一哲作贼心虚地删去了第二稿中以下一段文字：“在历史上的一切劳动阶级中，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是向前看的，其他的一切劳动阶级即使要求革命，也往往是向后看的，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这正好暴露了他蓄意否定产业无产阶级是真正新兴的领导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又妄图掩饰他对一切劳动人民的厌恶和仇视。由此可见，他鼓吹和标榜的所谓“新兴的社会力量”不过是一小撮腐朽的反动的力量，他为这股力量叫嚷要“民主”，要“法制”，其不可告人的祸心，正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早已被推翻了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难道不是昭然若揭的吗？

李一哲在贩卖他的先辈们的破烂，对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其伪装的手法，也是从他的先辈们抄袭来的，仍然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只是由于叛徒卖国贼林彪早已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广大革命人民正在继续批判和清除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改进工作，乘胜前进；因此，他不得不打起批林作幌子，标榜只有他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才是批林的英雄。实际上他批林是假，剽窃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加以实用主义的歪曲，为林彪的《“571工程”纪要》点缀美化、招魂骗卖是真。他在歪曲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时候，却反咬一口，诬蔑我们是什么“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啦，什么“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合而为一的”啦，什么“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啦，什么“非历史主义”啦，“无差别境界”啦，咒骂得真够得意忘形。但所有这一大堆臭骂，恰恰就是李一哲继承林彪的唯意志论和天才史观，打着红旗反红旗所采用的拙劣手法，也恰恰是李一哲丑恶嘴脸和险恶祸心的自画像。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只要我们将剥去李一哲的伪装，就可以看出，李一哲抛出这株毒草，就是为了兴风作浪，蛊惑人心，以聚集什么“新兴的社会力量”、什么“光明正大的反对派”起来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和当前的大好形势，起来造无产阶级的反，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这株大毒草的极右实质。

(三)

我们到现在才把这篇大字报印发给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批判，是有这样一个缘由的。从根本上说，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绝大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真理在我们手里，不怕阶

级敌人造反。我们从来欢迎和支持人民群众运用“四大”武器来打击敌人，批评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的监督。这对于反修防修，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好事。当然，大字报这个武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但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毒草冒了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可以从反面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当中，提高用马克思主义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学会如何更好地加强自己阶级的团结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以打击敌人，从而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从李一哲大字报出笼到定稿这一年多来的情况充分证明了：

第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全市革命人民，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有很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敢于斗争而又不断学会善于斗争的人民。他们尽管对这株毒草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但没有上它的当。相反的，是步步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团结战斗，因势利导，一步比一步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和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第二，尽管李一哲竭力挑动，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悲天悯人”，时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极尽他所代表所反映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切剥削阶级的绝望叫嚣的能事。他装扮得煞似从天而降的“新兴的社会力量”的天才代表，或是什么“似曾相识”而归来的“燕子”。并且咒骂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商业，将他的洋洋大观的毒草，故意封贴住百货商店的陈列橱窗，狂

妄地叫嚣什么他的毒草比陈列的商品还要美，真是表演得忘乎所以。但是，效果如何呢？效果是有的，其一是他激起了广大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除了有的同志一时按捺不住，曾在大街上给他张贴批判的大字报以外，更多的是看穿了他的诡计，坚持在本单位深入批林批孔中给予批判。其二确实也有少数人为他喝采的。但这其中有不尽相同的情况，一种是一时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的善良的人，而他们也会在斗争和学习中，总结经验，提高识别能力，不会继续上他的当的。再一种就是李一哲真正“寄予希望”的什么“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那倒也颇有那么几个。但他们象几个苍蝇嗡嗡叫的和声，岂不是更加和出一切剥削阶级“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怀旧情绪”的哀鸣吗？到头来，“无为有处有还无”只能维妙维肖地成为李一哲“徘徊吟咏”“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极其孤立的写照吧了。

现在是广大革命人民将毒草变成肥料的时候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一切妄图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反革命目的的反动势力，不管是张牙舞爪的豺狼也好，还是化装为美女的毒蛇也好，统统都将在普及、深入、持久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住尾巴，打翻在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共广州市委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

附：一张反动大字报：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 一 哲

1974年11月街头张贴序言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 关于林彪体系

(四) 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 谈反潮流

(六) 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1974年11月街头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这一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以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而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都说一说。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了。但是，我们却知道6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样事情：一是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的国家打不胜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以断言，

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187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退学和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容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止地荫及其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杀害他们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所提出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的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一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介石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讨生活。五十年、一百年后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现在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的，是和武汉几乎一样的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的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的皇宫前面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备好了水龙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也没有清除干净，也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了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应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

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18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瘖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18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18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18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18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

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至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

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那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教礼仪——早祈祷、晚悔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浓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赛。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假、丑、恶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经济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即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为“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3.18”、“4.12”、“5.30”、“6.23”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有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是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假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吗？这是放肆的诬蔑！